

· 会议综述 ·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25届研讨会综述

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主办、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承办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25届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10月27—29日在徐州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1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程恩富学部委员致开幕词。会议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发行150周年，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为背景，围绕外国经济学说与“一带一路”建设为主题，展开热烈讨论。现将会议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新发展

本次年会高度关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提供论文40余篇，表现了学会雄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底蕴、马克思情节和时代责任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学部委员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为依据，概括了伟大斗争的14个重要内涵和方面，即关于各领域斗争、改革方面斗争、反腐败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和党内思想斗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斗争、法治基础上的斗争、反分裂斗争、军事斗争、反殖民地反霸权的斗争、反恐怖斗争、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同自然灾害的斗争、禁毒斗争和敢于善于斗争。他指出，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握时代大势，回应实践要求，敢于和善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并将“伟大斗争”贯穿在“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工作之中。

武汉大学颜鹏飞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应是具体的国情和时代主题，该起点范畴的选择至少应同时具备抽象性、现实性以及孕育一切矛盾胚芽的始基性三个条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应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为指导，将中国实践中大量涌现的感性材料和成功经验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新表述、新话语、新概念、新范畴，从而形成这一理论制作过程的最终产物，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并由此彰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方法的当代价值。

南京财经大学周绍东教授提出以发展为主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条件下，以理论创新引领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以“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为研究对象，联系生产方式（一般）研究生产力，联系生产方式（特殊）研究生产关系，将微观层面的主体行为、中观层面的区域和行业资源配置、宏观层面的制度建构等诸多问题纳入研究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侯为民研究员指出，应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科学理论逻辑、经济发展内在规律和经济发展问题导向四个方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推动了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此外，与会学者阐述了马克思的私有制起源理论、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维度、剩余价值国际转移及其经济效应，探讨了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对《资本论》的态度，系统比较了《资本论》、《新资本论》、《21世纪资本论》，等等。

二、西方主流和非主流经济理论新进展

本次年会不仅关注西方主流和非主流经济理论新进展，而且高度关注理论的经世致用。

201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以表彰其在开拓行为经济学领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北京工商大学徐丹丹教授认为,塞勒的贡献在于从理性行为批判新视角分析消费者行为;通过探究有限理性、有限自利以及自我控制的缺失,演示人类特性如何系统性地影响个人决定以及市场结果。塞勒理论的现实意义在于帮助行为经济学创造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领域,对许多经济研究和政策制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其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研究结果尚需验证。行为经济学看似是对新古典理论的挑战,其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新古典经济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使然。

吉林财经大学魏旭教授探讨了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实践检视与方法论,指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是建立在“斯密教条”和萨伊“三位一体公式”基础之上。要素价值论自身的混乱和遮蔽价值来源的本质,使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在应用上遭遇诸如价值源泉的错设,并使要素分解无法真实反映要素的增长贡献;资本和技术的不可分析性使要素贡献无法被有效分解;“劳动要素化”分析使其无法真实反映增长的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培育增长新动能的政策设计不能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依据和目标,而应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框架下,既要激励生产力因素又要激励生产关系因素,以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进而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乐明研究员认为,非中立性和非自愿性是公共选择失灵的原因。动员受益轻微或受损轻微的多数群体参与公共选择是确保公共选择有效的关键。中国经济巨大成功的关键在于基于协商民主的公共选择可以保证“好”的公共品被提供,“坏”的公共品被限制。以人民为中心应是我们经济决策的基点。

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指出,现有经济思想史对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研究重视不够,使该学科很难改变被经济学界边缘化的命运。今后“新经济思想史”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应集中创建“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两个子学科;在研究目的上注重经世致用;在研究方法上实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创造解释学”的有机结合。

云南大学张林教授指出,经济思想史事件是一系列串联经济学科发展的学科内部事件,它们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英国“科研评估活动”(RAE,2014年被REF所取代)的后果驱逐了异见经济学家,有力推动了新古典一元化观念的扩散。英国学科评估给中国经济学学科评估的启示在于,在不改变其他评估指标的情况下,由经济学各二级学科从业者按二级学科推荐“A刊”名单。

此外,与会学者阐释了国外创新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熊彼特的增长理论以及弗里德曼的经济政策,等等。

三、中国现实经济热点问题新探究

本次年会也高度关注中国现实经济热点问题,并试图给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北京大学苏剑教授指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中长期问题主要表现为潜在增长率下滑和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吻合度不够;五大重点任务未能正确认识和涵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间接管理代替直接管理;法律手段代替行政手段;价格手段代替数量手段。应以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基点,激活市场功能。江苏师范大学李子联副教授指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增长动力应从制度调整的角度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公平性改革、完善高等教育质量的保障机制、深化财政税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以及实施“数量回稳”和“质量提升”相并举的人口政策。

2. 中等收入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李翀教授指出,我国经济学界对“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的分析存在泛化的情况。“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竞争力造成的,而且也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达不到一定的程度造成的。我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必须要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 中国式治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杨春学教授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框架无法解释中国治理创造的经济奇迹。我们可以把英美的国家观称之为“个人主义国家观”,把中华文明的国家观称为“整体主义国家观”。我们必须用整体主义国家观来解释中国经济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

系。复旦大学周文教授指出，中国崛起的理论意义在于突破了西方现代化中心论的神话，凸显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功。用市场化改革和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中国崛起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崛起的实质是在国家治理能力上超越西方。

4.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华南师范大学方兴起教授认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防范化解潜在的非现实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美国2007—2009年大衰退使我们认识到不仅传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源在发挥作用，而且美国经济活动的“脱实向虚”和美元的“潮汐效应”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新来源。清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种种误导政府决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偏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是防范化解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此外，与会学者探讨了供给侧经济学与里根经济学，阐述了东北重化工业的供给侧改革的困境与出路，做强做大做优国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等。

四、“一带一路”与国际经济新格局新探索

本次年会还聚焦“一带一路”倡议和关注国际经济新格局。

1. “一带一路”倡议。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指出，在顺应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抵抗、限制和约束超额剩余价值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向更加发达的国家、不太发展的国家向中国家的逆向流转。“一带一路”不是掠夺弱国的剩余价值、转移剩余价值和推行经济霸权，而是倡导贸易畅通平等发展，缩小各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差异性和加强各国的合作共赢。在发展理念上要更加强化“逆不平等性”意识，而不是单纯的开放经济和参与全球化；在发展战略上要更加明确以“逆不平等性”为根本宗旨；在具体政策上要加强对“逆不平等性”的具体制度的设计和机制的运行。江苏师范大学沈正平教授指出，“一带一路”沿线我国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建设和发展存在的障碍表现为产业特色不突出、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和国际化人才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全面加强双边政府沟通，深化完善园区合作机制，科学制定园区产业规划，聚力推动园区配套建设和大力培育引进国际化人才。

2. “逆全球化”浪潮。吉林大学纪玉山教授指出，“逆全球化”浪潮只能严重破坏全球自由贸易与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侵蚀人类社会合作共赢的成果，给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面对“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影响，致力于以“中国方案”和“中国应对”使自身成为新一轮全球化规则的建设者与全球治理者是中国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的战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张超颖博士认为，逆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全球化仍然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中国提出的“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是引导全球化步入正轨的重大举措。

3. 特朗普经济政策对中美影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徐则荣教授认为，特朗普经济政策手段能促进美国国民消费和企业发展，但会加剧美国贫富分化、财政赤字和金融风险。我国要避免为“美国第一”买单，在金融方面落实我国的“穿透式监管”模式。上海交通大学吕守军教授认为，特朗普经济政策对中国产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美国可能会要求中国加大对其粮食和飞机的进口，要求放开教育、医疗、金融等有发展潜力的服务业，但对中国的出口直接影响较为有限。中国应加强本土主导的经济圈建设。

4. 美国崛起时代的关税政策。上海财经大学伍山林教授认为，在美国崛起时代，关税保护政策为美国国内产业的市场竞争提供了制度庇佑，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比较优势。所谓美国依赖自由竞争实现崛起的论断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认识。

此外，与会学者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等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徐则荣）

（责任编辑：刘新波）

（校对：刘洪愧）